

大卫·贝罗的“编码解码”说 ——兼与霍尔理论比较

林羽丰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20世纪70年代, 英美传播学者都从香农模式中获得启发, 美国学者贝罗更是早于霍尔提出了受众取向的编码解码理论。沿着这一线索, 本文追溯了贝罗的学术生涯和思想演进, 并以霍尔理论为参照, 对二者作比较解读。通过比较, 本文发现两个编码解码理论在传播隐喻、系统论、受众主张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但这种重合的背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来源。贝罗深受怀特海哲学的影响, 而霍尔则兼容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符号学, 二者回应着不同的时代问题, 也由此走向不同的理论命运。这样一次理论对话实际上是架空的, 缺乏事实依据, 这可能是本文的局限所在。

关键词: 贝罗; 霍尔; 编码解码; 传播过程; 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3) 02-0077-10

《编码/解码》是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1932—2014) 的代表作, 但霍尔却不是第一个提出编码解码的。1960年, 美国传播学者大卫·贝罗 (David Berlo, 1929—1996) 同样从信息论出发, 提出了受众研究的主张和 SMCN 模式; 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传播过程”的理念, 以突破传受二元论、追求对传播的动态解释。

而今, 我们一听到编码解码首先想到的是霍尔, 而贝罗则鲜有耳闻。本文有意把贝罗提出来, 是因为他和他的观点深嵌北美传播学主流脉络中, 直接与早期奠基人存在联系, 但他又具有背离的一面, 在整体思潮的推动下, 较早开始对效果研究的反思。更重要的是, 他与霍尔有着诸多巧合, 却没能成就霍尔理论那般巨大的影响。是什么造成了两个理论平行却悬殊的命运? 这种悬殊又意味着什么? 本文所做的就是为二者搭建一次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理论对话。这样的并置能让我们看到受众研究史上的一种可能性, 进而加深对当下受众研究传统和英美学统的理解。

一、大西洋两岸都在谈编码解码

1973年, 也就是霍尔正式接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CCS) 主任一职后的第二年^①, 他在莱斯特大学完成了一场学术报告。讲稿刊登于当年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上, 题为《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此后直到1980年, 《文化·媒介·语言》一书将其收录出版, 这篇讲稿才以《编码/解码》为题与世人见面。这篇文章的新意在于: 通过对两大传统的“接合”^②——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电视生产过程并发现传受的结构区别, 以结构主义符号学解读电视文本, 并指出电视内容的建构性和内在霸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地方性视阈下大众传媒与乡村振兴研究”(19XWC001)。

作者简介: 林羽丰, 男, 助理研究员, 传播学博士。

① 1968年, 霍尔从霍加特手中接过了中心, 出任 CCCS 执行主任, 1972年升任主任, 直到1979年卸任。(Morley D, Schwarz B. Stuart Hall obituary: influential cultural theorist, campaigner and founding editor of the New Left Review [N]. The Guardian, 2014.)

② articulate, 这是霍尔对自己“不作保证”的思想引据所特有的表述。

权——搭建了一套从生产环节到表征内容与阶级、权力、意识形态广泛联系的大众传播理论体系，进而给出了受众的三种解码立场。^[1]

《编码/解码》开启了 20 世纪末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成为这一领域至今不断回溯的经典。然而，霍尔并不是第一个从编码解码出发提出受众研究主张的。

1958 年，霍尔受时局触动^①，毅然中断了他在牛津的博士学业，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萨缪尔（Raphael Samuel）等一道投身新左翼阵地建设。而彼时大西洋对岸，一位名叫大卫·贝罗的年轻人顺利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拿到了传播学博士学位。两年后，霍尔与他人共同发起《新左派评论》并出任主编，而贝罗则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传播的过程》（*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1960）。这个研究同样从编码解码出发，落脚在受众研究上。过程中，贝罗细致拆解了传播过程、传播过程的一部分、各部分的诸因素，最终组建了一个与物质、技术、认知、社会等相互关联的传播系统。

20 世纪 70 年代，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围绕“编码解码”的传播学讨论，它们有着相同的缘起、相近的观点、同样的关切。这种不谋而合令人好奇：为什么他们都从编码解码开始？又为什么都走向受众研究？更耐人寻味的是，霍尔理论此后折桂加冕成为经典，而贝罗则乏人问津，二者内部存在什么差别？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没有联系？本文尝试厘清这些问题。

二、贝罗的编码解码学说

（一）贝罗其人及早期经历

大卫·贝罗是与霍尔同时期的一位美国传播学者，曾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师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 1907—1987）。作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学生，贝罗接受了为学科“开枝散叶”的使命。1958 年，他一毕业便着手组建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大众传播系并担任系主任，尔后又参与了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筹建。1971 年，贝罗赴任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校长，但不久就因经费使用不当而黯然下台。^[2]此后，贝罗南下佛州，从事传播管理咨询工作，与学界几无瓜葛。1996 年，贝罗在佛州去世。^[3]

贝罗的学术精力主要投注在研究受众上。攻读博士期间，他就关注受众在传播中的认知问题，曾对一档电视节目的受众态度变化做过研究^[4]，也从修辞学方面与人合作研讨受众问题^{[5][6]}。从教后，他还研究过受众对信源的态度。^[7]贝罗关注受众的认知，这多少与他本科心理学的专业背景有关。

（二）传播过程的提出

“传播过程”是贝罗的思想结晶，可以称为贝氏的编码解码理论。该理论并非一次性提出，而是由前后跨度近十年的多份研究共同构成。其中一份是 1960 年出版的《传播的过程》。在这个研究里，贝罗首次阐述了他的编码解码思想，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受众研究的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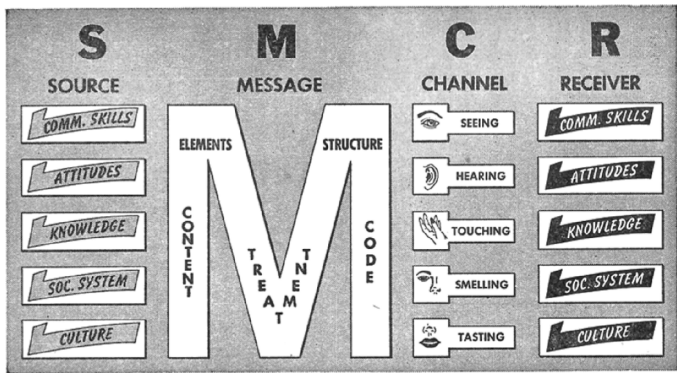
在书中，贝罗首先是提出了一种“过程”的理念——将传播视为动态连续的变化（continuous change）^②，主张全面把握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要素。为了更好地描述传播过程，贝罗引用了当时广为

① “……1956 年……一方面苏联坦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入侵了苏伊士运河地区。……从更深层次来说，这两件事为我们这一代人设定了政治上可以容忍的边界和极限。”（观察家：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与时代 [N/OL]. 检索于 https://www.guancha.cn/Stuart-Hall/2014_02_12_205477.shtml。）

② 在 1960 年阐述“过程”的理念时，贝罗就提到怀特海了，可见其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特海的影响。（Berlo D.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24.）但这时，怀特海哲学在贝罗的论述中却又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占据很大篇幅。

引用的“香农模式”^①，对其信源、编码者、信息、渠道、解码者、信宿的概念和关系几乎可以说是照单全收。^[8]进一步地，贝罗将信源、消息、渠道、信宿认作主导传播的四个关键要素，并逐一展开，由此构建了一个分析传播的框架系统。^②这正是贝罗日后被提及最多的理论贡献——“SMCR 模式”（见图1），也被称作“贝罗模式”^③。

“SMCR 模式”的亮点在于其不再囿于传播本身，而把社会文化诸因素都纳入进来。在论述信源（Source）、接受者（Receiver）时，贝罗就特别强调，要关注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传受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声誉、文化背景、主导价值观、传统和禁忌、他人的期待，和他们的社会阶层。^{[8] (49)}在贝罗看来，这种成分上的复杂性同时存在于传受两端。于是，他提出，要对受众给予与传播者相同程度的重视。当时，美国的传播学界还在钻研效果与控制，贝罗的提法实质上是背离这种倾向，这在当时的北美传播学界不能不说新锐。贝罗在青年阶段就形成了编码解码理论的主体，锚定了受众研究的取向，这些工作比霍尔早了13年。



A model of the ingredients in communication.

图1 贝罗的编码解码系统^{[8] (72)}

（三）过程理念的成熟

如果仅凭1960年的那一份研究，贝罗的编码解码说最多也只是对行政学派研究范式的一次有限度的回拨。但1977年，也就是贝罗因经费风波蛰伏四年后，他在《国际传播学会年刊》上发表了一篇对自己的《传播的过程》的回顾。^[9]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其传播过程研究的本体论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展受众研究的方法论，是贝罗编码解码理论成熟的标志。

在贝罗1960年提出“传播过程”之后的十余年里，断断续续有人质疑其理念有名无实。贝罗回应称，究其原因在于“过程”这个概念被他们混淆了。他将当时对“过程”的主流理解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将过程“作为神话”（mystery of process），这种理解用过程解释传播、用传播解释过程，但概念本身模糊不清，“过程”本身接近于一种符号。第二种是将过程“作为组织”（process as complex organization），这种理解以关系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因为关系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减少，而不确定性带来了信息

① 贝罗的原话是“one of the most-used contemporary models”。

② message 包括作为信息内容的成分及其结构，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传播者对符码的处理；channel 即传播采取的各种手段，包括视、听、触、嗅、味的感官和声、光、电等外在介质；而 source、receiver 作为人的因素，包含传播技巧、态度、知识水平、社会系统及所处地位、经历及文化背景。（Berlo D.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41-69.）

③ 《传播的过程》并不意外地秉持实用的理念，后半部分忽然转到人际交往实操的讨论上，以致获得了如此意味深长的评价：这本书既没那么具体，也没那么抽象……有的部分甚至讨论起文法措辞（too studied in stylistic device），适合大一、大二学生读。（Nixon R. Book Review: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60, 37 (4): 594-595.）

的需求；而关系在研究中往往落实为相关性，所以这类研究往往采用相关性分析、因素分析；贝罗称这种思路是笛卡尔主义的，即表现出一种对主体的关注。^①第三种是将过程“作为效果”（process as effect），是强调客观性的牛顿主义的；这种理解坚信人的行为与自然界一道遵循着绝对规律，因此以行为为研究对象，并对关系研究一度构成一种排挤；它们追求因果解释和理论的一般化，因而关注行为的时间顺序而不关注平行关系；并且，一味关注刺激和预设反应之间的联系让这一思路下的研究十分功利，很容易与商业、宣传和控制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比照今天我们对行政学派的惯常批判，贝罗的论述有很多地方与我们高度一致，表现出很强的文化倾向和主体意识。再联系贝罗所沉浸的北美传统，他能够生发出这样的反思是颇为难得的。

不过，在这篇文章中，贝罗真正要推举的是第四种对过程的理解——“作为活动的过程”（process as activity），一种兼顾关系、时间和结构的传播视角。展开来说就是，用传受主体所处的随时间变迁而变化的结构性关系来解释传播。贝罗认为：传播不是单向矢量，传受对传播具有等量的影响；并不是传者的信息导出了受者的反应，而是包围着信息的关系和文化规则；由此，传播不是意义传递的过程，而是传受双方在关系和规则下共同引用意义的过程，传受共同缔造了传播的结果；而这个过程又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可见，贝罗的编码解码思想已经包含了鲜明的文化取向，与美国主流的功能主义取向鲜明地区别开来。

也许是对一味思辨感到不足，贝罗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还下场示范了这种“作为活动的过程”的研究操作。在这次有限的经验操作中，贝罗用数学（概率）的手段来贯彻了他对关系和变动的强调——按照他的说法，数学是和传播一样存在于观念中的事物，因而最适合解释传播。

无论如何，到1977年的这篇回顾，贝罗的编码解码理论得到了一次沉淀，明确发展成一套强调主体、关系和文化规则，着眼长期和动态的文化倾向的传播研究理论。可以说，贝罗走到了自己这条受众研究理路的远端，暗合了当时正在抬头的后现代思潮。而指引贝罗抵达这一不逊于霍尔的深度的是怀特海的哲学思想。

（四）传播过程背后的过程哲学

不同于1960年研究中的只言片语，在1977年的回顾中，贝罗反复提及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 1861—1947），后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但不悲观的气质构成了贝罗理论的基调。

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撼动了整个自然科学界，同时也动摇了整个思想界由牛顿时学生发出的乐观的机械宇宙观，启蒙运动以来视一切为必然机器的想法被逐步抛弃。^[10]在这个背景下，怀特海复兴柏拉图思想^②，一反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的主流，竖起了形而上学的大旗，创立了“过程哲学”^③。这一切都发生在怀特海从牛津大学退休而返聘至哈佛大学后，所以美国思想界在当时最先受到怀特海哲学的影响。

过程哲学有两个重要原理：一个是过程原理，即认为现实世界就是各种实在物（actual entity）的生成过程，生成的过程构成实在本身。一个是相对论原理，即实在物是许多潜在可能性的合成，宇宙中的每一项都会在任何一种合成中被涉及。^[11]事件与事件相联系，每一事件都扩张进入其他事件，构成

① 贝罗还提到了网络分析法和Q方法，将它们划入第二种“作为组织”的过程研究——不过他补充道，它们在研究相关性上不像常规思路那样有着僵化的预设。

② 柏拉图《蒂迈欧篇》：“事物永远处于生成和消亡过程之中。”

③ 他自己也称之为“有机哲学”。

对方的一部分，而它本身包含着许多其他事件。^[12] 整个宇宙就是各种实在物、事件相互连接、包含而成的有机系统。于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是由性质和关系组成的有机体，而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13] 贝罗所提倡的“作为活动的过程”就源于此。

怀特海还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元论。他认为，流动和变化是世界的本质（nothing but flux），永恒的是连续不断的生成过程而不是生成过程的不停重复，因此一劳永逸的科学解释是不存在的。在永恒变动中，主客体在实在物的相互作用中生成，主体意识源于作用经验，而相应唤起主体意识的就是客体。这么来看，无论是牛顿主义还是笛卡尔主义在贝罗的学说里都是负面的、不足的，他所主张的传受一致本质上是对主客二元论的否定。

坚持过程本体、重视关系和变化、提出传播的结构性，贝罗的编码解码思想深受怀特海的启发。这意味着，贝罗的受众研究主张并非从效果研究内部生发的改良主义，而是从整体的科学危机中反省得来的文化转向。

三、文本比较：共识之下的深刻分歧

（一）重合度高却命运悬殊

将贝罗理论与我们更为熟悉的霍尔理论并置会发现，两种编码解码说在理论路径的选择和关键问题的回答上存在诸多共通之处。

其一，二者都援引了当时通讯理论的最新成果，以香农、韦弗的数学模式^[14] 为传播原型，并都采纳了“符码（code）”“编码（encode）”“解码（decode）”的隐喻。其二，两人都明确反对传播是自然的，虽然他们都照搬了电报物理学的逻辑，但也都跟进强调了传播的主观属性。其三，都将传播看作复杂系统并给出了一套详细的框架——贝罗的是SMCR模型，霍尔的则是意义结构及其过程（program as meaningful discourse）。其四，贝罗和霍尔在传受结构的想象中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对称设计，也就是我们在两人研究中都能看到的传受内部构成要素一一对应、不作区别。其五，两人都声明了要素间的联系，尤其强调传受主体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不同于当时的主流。其六，藉由传播尤其是受众方面的复杂结构，两个理论都着力强调了受众的重要性，得出了受众研究的主张。考虑到二人在历史上并无交集，贝罗、霍尔在编码解码上的高度重合令人称奇。

两个编码解码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正如我们所知的，霍尔凭编码解码一说，逐步进入传播学的中心，文化研究在他的引领下收获一批追随者，霍尔的名字也一度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15] 相比之下，贝罗被追忆的只有他的SMCR模型。^{[16][17][18]} 国内提及贝罗的研究屈指可数，话题也与传播学相去甚远。^{[19][20]} 至于贝罗不遗余力提倡的作为活动的传播过程，他的过程概念、关系研究、数理表达的观点都被淡忘了。

思想之流腾起两朵浪花，为什么一朵被记住，另一朵却被遗忘呢？这值得进一步的考察。

（二）共识之下分歧深刻

在比较前，需要先明确本文比较的思路是从文本和语境两个维度展开的。文本的思路遵奉文献教旨，关注理论观点本身的连贯和差异；语境则从思想主体、社会思潮、学科环境等文本以外的环境因素切入去厚读文本。这一小一大两个维度可以保证我们对两个编码解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审视。

当我们先从文本的维度细察二者的观点分歧时就会发现，在共识后的展开中，贝罗与霍尔的观点又明显地区别了开来。

首先，两人都反对自然观，但对“主观”的定义大相径庭。贝罗认为的传播的主观性在于，传播是发生在心理层面的活动，是某种观念、意图被传播者转成符码，经由一定通道抵达收受者而得到解读的过程。这是以心理学为代表的认知科学的典型观点。而霍尔的主观性是说，传播符号的表征规则是人为建构的，这一点源自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观点。

其次，两个理论都表现出很强的系统论色彩，但二者搭建的系统却有内外之别。贝罗挑明的结构是传播系统本身，因为按照怀特海的观点，传播的各部分即是“实在物”，传播及其组成就是各种潜在可能性的集合、永不停歇的生成过程，这种复杂是怀特海哲学所强调的复杂。而霍尔所描述的结构是指社会结构，传播是因为深嵌社会结构、联系着阶级和权力而变得复杂的，这种观点源自马克思主义。

再者，两人都采取了对称的传受构成设计，但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补充说明。贝罗将传受都解析为传播技巧、态度、知识、社会系统、文化的组成，由此提出传受的构成是相同的（similar systems）。^{[8](29-31)} 霍尔的传受都由知识结构、生产关系、技术基础构成，但霍尔却似有矛盾地提出传受“不构成直接的同—性”^{[21]①}（见图2）。二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对称设计的含义，将受众描述成与传者同样复杂的系统以肯定受众的能动，却又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这其中包含深刻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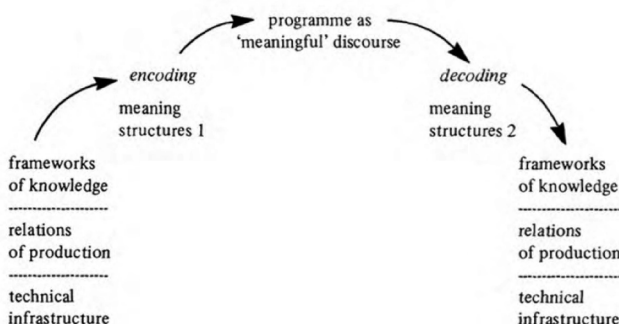


图2 霍尔的编码解码系统^{[21](120)}

还有，贝罗、霍尔都强调传播中的关系，但贝罗说的是传者与受者、技巧与态度、知识与文化、态度与社会系统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这种相关性随时间的变化，一如他的传播过程理念那样。而霍尔所说的关系是权力。霍尔看到的是传受之间的权力地位、传受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传播符号的意义结构与主导结构的权力地位、在整个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这种视野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赋予他的。

最后，两个编码解码最终都落在了受众研究的主张上，但得出的方法论是迥异的。贝罗提倡认知分析、数学方法，就像他示范的那样，而霍尔主张将文化研究的方法拓展到大众流行文化上，对传播开展心理的、符号的研究。

（三）受众研究主张上最终分道扬镳

一方面，在理论的诸多节点上交织重合；另一方面，重合背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来源。这是贝罗思想与霍尔思想的真实关系（如图3）。

① “They do not constitute an ‘immediate identity’. The code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may not be perfectly symmetrical.”（Hall S. Encoding/decoding [C]. Hall, S. et a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0: 117-119, 120,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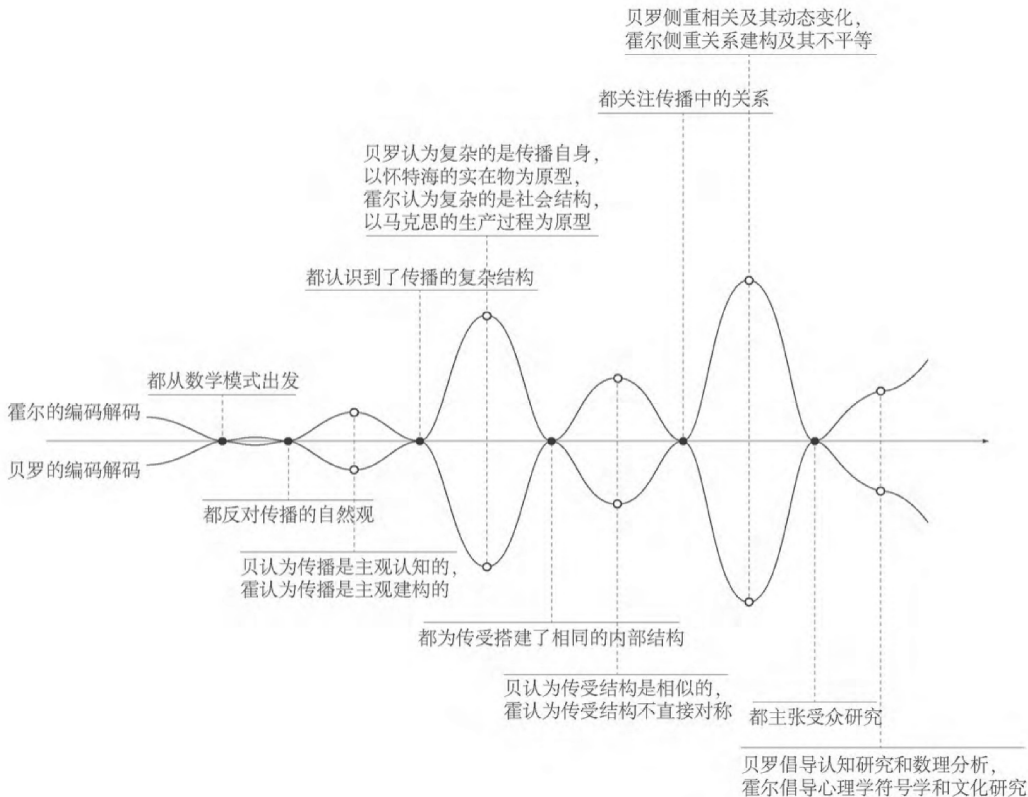


图 3 贝罗、霍尔编码解码理论比照图

经由编码解码组建传播系统，再由传播系统发现受众意义，贝罗得出了一套受众研究主张。这套观点侧重把握受众的认知与传播内外的联系，并试图用数理相关性来描述主体与传播事实之间动态的、双向的联系。而霍尔的编码解码则把我们引导到受众的收受和文化图式上，聚焦的对象是受众群体的观念和处境，提倡的是阐释的方法，追求的是认识文化对传播的形塑机制。总而言之，贝罗和霍尔在阐发编码解码的思路几度相逢，却最终分道扬镳，在受众研究的思考上留下了两种形近但实质上相斥的主张。

四、语境比较：两个理论的主体和外部联系

理论不仅是研究者个人的，也是一定时空情境下的社会的结果。理论孕育过程中卷入的人事物一应构成了解读理论的前后文。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对两个编码解码的行动主体和思想环境再作一番比较。

（一）作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和个人

理论作为一个过程至少牵涉三类行动主体——浪漫的启蒙者、勤劳的开创者、见机行事的继承者——三者前赴后继，构成理论发生发展所必需的研究团队。霍尔的编码解码清晰地呈现出这么一条线索——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霍尔、莫利（David Morley）。是威廉斯首倡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22]的研究视角，打破了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间长期存在的壁垒，并且从一开始为文化主义输入了反精英的大众情结。这才有了后来霍尔主动踏入大众传播领域。而莫利作为霍尔的学生兼同事，将研究对象从象征受众的文本进一步推进到受众本身^[23]，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霍尔理论的批量生产，

尽管霍尔对此颇有微词^①。

相比之下，贝罗理论的研究主体则显得涣散还自相矛盾。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是贝罗理论的启蒙者。在贝罗求学期间，奥氏正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系执教，很有可能直接教授过他心理学。^[24] 伊利诺伊时期是奥斯古德的高产期，其中就包括他对传播学的介入。他曾对香农模式做出两点修正：把人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从而与心理学的单级信源—信宿学习模式（the single-stage S-R learning theory model）适应；把人当做一个传播综合体，提出编码、解码、译码三重角色的经典模式。^[25] 这直接启发了贝罗，也启发了贝罗的导师施拉姆对传播模式的思考。

然而，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晚年的施拉姆将自己、奥斯古德以及许多人的研究讨论归入一个他称之为“大众传播过程模式”的框架之中，这当中也包括他的学生贝罗的理论。^[26] 贝罗在思想论述中曾极力想要抽身于主流效果研究，这份努力因为导师强大的学术影响而顷刻间被化解了。此后，人们主要地是在施拉姆的叙事中认识贝罗理论，也难免有人草率地给它贴上线性、忽略反馈、无视受众的标签。再之后，贝罗淡出学术界，他的学说连同他自己一并湮没在时代之中。没有走出启蒙者的影响，又没有后继者发扬光大，这是其理论命运的重要成因。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二人的个人遭遇和学术见识。无论是贝罗还是霍尔，他们的编码解码说都与自身经历有着莫大关系。贝罗在校期间曾负责外籍助教的培训课^[27]，而霍尔则是以有色人种的身份生活在英国，长期亲身体验着种族的隔阂，个中政治情结早有铺垫。而在理论见识上，霍尔引经据典却“不作保证”（without guarantees），这一点虽然引发过争议却给予了霍尔开阔的发挥空间。正因如此，霍尔借鉴结构主义符号学，却能拒绝文本中心主义，在构思传受结构时借鉴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直接同一性”却又大胆提出不直接对称的观点。相较之下，贝罗被怀特海和认知心理学完全征服了，他甚至不能察觉出它们内在的张力，以致最终得出的对受众认知作数理研究的思路根本上背离了怀特海哲学的方法论。^[13]

（二）整体的学术思潮和学科取向

学术研究总是被特定的时代思潮所裹挟，但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不同人仍然会看到不同的问题，得出不同的答案。这考验的是一个研究者的眼光、见识和一点点运气。贝罗在时代思潮中选择了过程哲学，后者是对 20 世纪初物理学危机的哲学回应。反观霍尔追随的是文化主义，它脱胎于二战后福利型资本主义的现实——这个时期，阶级矛盾和不平等被巧妙地遮掩起来，大众文化崛起而工人阶级文化看似消散——文化主义要做的就是严肃地审视大众文化并从中发现新的不平等。^[28] 虽然在那个年代这两大问题都尤为重要，但很明显，贝罗观照的是渐趋缓和的旧问题，而霍尔的是面向未来的新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变得越来越紧迫。从这个角度来说，两种编码解码说的命运反映了怀特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末所具有的不同生命力。

两个编码解码也反映出了二人对待现实的不同态度。贝罗关心的是传播世界中的规律，而霍尔则是要揭露社会文化中的不平等。结构主义符号学让霍尔看到了符码的建构性，但霍尔更看重从结构主义中得到的批判性，他试图把意识形态批判注入媒介研究中，用以揭示文化霸权对现实的歪曲。^[29] 霍尔认识到符码的建构并不出自社会的多元合作，而是少部分特权阶层的独断，反过来它也只服务于少

① 霍尔说过：“莫利的研究并未完全采纳‘编码/解码’模型……关于大卫·莫利，我倒是有个疑问：你小子到底是怎样在真实存在的人身上检验理论的？”（迈克尔·古列维奇，派迪·斯坎内尔：《赢得经典？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C]·伊莱休·卡茨等（主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7。）

数特权阶层，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在贝罗看来，传播是一个“make-believe”的过程^[9]，而霍尔认为它是“construct-subject（构建—规训）”；贝罗因为传受均质而强调受众，但这正是霍尔所极力批判的多元主义（pluralism）的谎言。在他看来，多元主义实质上回避了传受不平等的问题。霍尔的态度鲜明：传受的不平等是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非传播资源的不平等，而要做到传受平等就是要实现双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均势。

最后，传播学科的发展取向构成了两个理论的另外一重语境。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初创，开始出现最早的反思和分化^①，效果研究的前提受到质疑，学科内开始酝酿转向。传播学内部的这种变化是整个人文社科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②，而这又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政治运动紧紧地绑在一起。这些构成了受众研究兴起的宏大背景，它要求下一个发挥引领作用的传播理论是能够冲破机械的传受观的革命性的观点，而不是对以往认识的小修小补。这样的要求亲睐像霍尔理论这样富有颠覆性的洞见，而对贝罗理论则缺乏热情。

五、结 语

总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编码解码的传播学讨论在英美先后出现，却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局面。贝罗的“编码解码”说最终沦为效果研究的附属，而霍尔的“编码解码”说则开启了全新的受众研究。对二者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今天人们对霍尔理论的推崇。

至于究竟什么样的理论能够成为经典？本文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学术观点是不同思想土壤里分别生长出来的精神之花，而它究竟能收获多少目光、吸引多少蜂群、撒播多少种子，这其中微妙又自有道理。值得一提的是，在1977年的那篇回顾中，贝罗曾如此评价自己1960年的研究——当初的他并不明白“理论背后的深刻假设”——言外之意是，1977年的他自认为对受众研究取得了深刻的理解。当时的他想必信心满满，没曾想到时代的去向。

参考文献：

- [1] 陈力丹，林羽丰．继承与创新：研读斯图亚特·霍尔代表作《编码/解码》[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8）：100-113+129.
- [2] Milner Library of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Presidential history: Biography of David Berlo. Retrieved June 4, 2021, from <https://library.illinoisstate.edu/collections/presidential-history/berlo/>.
- [3] Tribune, C. & Berlo, D. Retrieved June 21, 2021, from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ct-xpm-1996-03-16-9603160107-story.html>.
- [4] Berlo, D. & Kumata, H. (1956). The Investigator: The impact of a satirical radio drama. *Journalism Quarterly*, 33 (3): 287-298.
- [5] Gulley, H. & Berlo, D. (1956). Effect of intercellular and intracellular speech structure on attitude change and learning. *Speech Monographs*, 4 (23): 288-297.
- [6] Berlo, D. & Gulley, H. (1957). Some determinants of the effect of oral communication in producing attitude change and learning. *Speech Monographs*, 1 (24): 10-20.
- [7] Berlo, D., Lemert, J. & Mertz, R. (1969). Dimensions for evaluating acceptability of message sourc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3 (4): 563-576.

① 比如从哥大应用社会研究中心出走的米尔斯，又比如赫佐格。

② 代表性的理论如这一时期提出的东方主义、地方性原理。

- [8] Berlo, D. (1960).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9] Berlo, D. (1977). Communication as process: Review and commentary.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 (1): 11-27.
- [10] 科布, 邵刚, 杨金额. 怀特海哲学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J]. 世界哲学, 2003 (1): 31-39+112.
- [11] 怀特海, 艾彦. 怀特海过程哲学观概要 [J]. 世界哲学, 2003 (1): 2-19.
- [12] 王南湜. 马克思与怀特海自然观的异同及其意蕴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 (2): 37-47+254.
- [13] 杨富斌. 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述评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3 (4): 75-82.
- [14] Shannon, C. (194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 379-423&623-656.
- [15]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去世 享年 82 岁 [EB/OL]. http://culture.ifeng.com/redian/detail_2014_02/11/33685544_0.shtml.
- [16] Stead, B. (1972). Berlo's communication process model as applied to the behavioral theories of Maslow, Herzberg, and McGregor.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5 (3): 389-394.
- [17] Kikoski, J. (1993).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ranational workplace: Models for public sector managers and theoris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 84-95.
- [18] LaBelle, S. & Waldeck, J. (2020).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for organization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 唐敏, 黄彦新. 基于贝罗传播模式的中学有机化学教学设计 [J]. 化学教育, 2016 (23): 14-19.
- [20] 汪永奇, 张佩成. 贝罗传播模式及其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J]. 新闻界, 2006 (2): 107-108.
- [21]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Hall, S.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17-127.
- [22] Williams, R. (1963).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 [23] 石长顺, 方雪琴. 电视收视语境与文本意义的重构——评戴维·莫利的民族志受众研究 [J]. 当代传播, 2005 (6): 18-22.
- [24]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Full record series list. Retrieved June 4, 2021, from <https://archives.library.illinois.edu/uasfa/1305020.pdf>.
- [25] Osgood, C. & Wilson, K. (1961). Some terms and associated measures for talking about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1-48.
- [26] Schramm, W. (1977).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s. In Schramm, W. & Roberts, D. (eds).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4-30.
- [27] Nixon, R. (1960). Book Review: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37 (4): 594-595.
- [28] 萧俊明. 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2 (1): 36-45.
- [29] 黄典林. 在文化与结构之间: 斯图亚特·霍尔传播观的范式整合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 (10): 110-118.

[责任编辑: 高辛凡]